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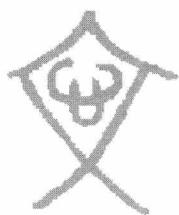
甘 阳

文明
国家
大学



YZLI0890146481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甘 阳

文明

国家



YZL10890146481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国家·大学 / 甘阳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

ISBN 978-7-108-03835-7

I. ①文… II. ①甘…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
IV. ①G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5276号

责任编辑 舒 炜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33

字 数 428千字

印 数 00,001—8,000册

定 价 49.00元

目 次

导论 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	1
----------------------------	---

上编 中国道路

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关于中国的软实力	19
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复兴	27
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33
再谈中国道路	45
文化中国与乡土中国：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前景及其文化	57
费孝通《江村经济》再认识	64
邹谠教授《中国革命再阐释》编者前言	73
汪晖教授《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评议	80
中国论述与亚洲论述	102

中编 第二次思想解放

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	125
重新阅读西方（“西学源流”丛书总序）	133
古典西学在中国	136
文明对话：为什么？谈什么？怎么谈？	146

“反美世纪”与“新世界主义”	177
新帝国与“反美世纪”	177
美国走向“布什民族”	183
中国的“新世界主义”	188
“拿起你的鞭子!”	195
超越西方文化左派	198
细读《文化与社会》	208
下编 大学	
从富强走向文雅	293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	302
中国大学人文教育面临的七个问题	330
大学通识教育的纲与目	336
大学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	349
附文一 《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一次以经典细读和小班讨论为 核心的通识课程试验（赵晓力 吴飞）	359
附文二 作为文化事业的通识教育：“全国首届文化素质通识教育 核心课程讲习班”综述（吴飞 赵晓力）	373
通识教育：美国与中国	382
通识教育在中国大学是否可能?	400
中国通识教育的务实之道	409
大学改革四论	423
大学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423
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	435
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改革的初步比较	446
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	456
留学运动三十年后	470

附录

附录一	十问甘阳.....	479
附录二	“我宁愿改革速度慢一点”	485
附录三	美育与通识教育（潘公凯 甘阳）	493
附录四	从第三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谈起.....	504
篇目说明.....		519

导 论

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

问：21 世纪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与 20 世纪中国是基本相同，还是将有所不同？

答：有所不同。中国在上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中国在 21 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格局。事实上凡认真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大多都指出，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同时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因此西方政治学界最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诚然，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巨大“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这基本也是 20 世纪中国人的主流看法；但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恰恰是，21 世纪的中国人必须彻底破除 20 世纪形成的种种偏见，而不是要把 20 世纪的偏见继续带进 21 世纪。我以为，21 世纪中国人必须树立的第一个新观念就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而 21 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能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中。

西方思想史家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表上

世纪的典型看法，即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和障碍。在他看来，20世纪中国的历程实际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或用中国本身的术语来说，就是从“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所谓“天下”不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而是历史文明的概念，其含义是说，中国人历来认为中国从古典时代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想是最高文化思想形态，但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侵入下，则不得不放弃这种文明至上的“天下”观，而以“保种保国”作为最迫切的中心问题。

列文森相当正确地指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特点，恰恰表现为最激烈地批判和拒斥中国的古典文明，因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中心关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他们认为中国文明传统即“天下”的观念已经成为建立现代“国家”的障碍，因此要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就不能不与中国的文明传统彻底决裂。20世纪以来中国人一波又一波激烈攻击中国传统的运动，以及今日中国人仍然普遍具有的强烈反传统情结，实际恰恰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物，其原动机乃在于建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

列文森等人的这些看法实际都来自于梁启超一百年前的名著“新民说”的基本看法，亦即认为中国人历来“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因此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从而无法形成现代西方人具有的强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梁启超认为，20世纪是西方“民族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代，“故今日欲抵抗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梁启超的这种“中国民族主义”，确实与西方现代性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建构“民族—国家”的路向相当一致，都是力图以“启蒙运动”的新思想新道德来造就“新国民”，从而将中国转成一个“现代民族”，即使这种“新国民”和

“现代民族”背离了中国的“祖宗家法”，也在所不惜。用康有为的话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但我们必须指出，无论梁启超还是康有为或其他 20 世纪中国先贤，都不同于列文森，因为这些中国先贤实际都只是把采取现代西方民族主义路线的“民族国家”道路看成是救急之计，而并不认为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长远之图。在发表“新民说”十年后，梁启超即发表了著名的“大中华发刊词”以及“中国与土耳其之异”等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可以说就是提出了“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因为他在这些文章中所讨论的“国家”，都不是指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国家”概念，而正是“文明—国家”含义上的国家概念，这种“文明—国家”的基础在于梁启超所谓的“国性”，实际也就是“文明性”。如他所言：

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网维全国人之情感受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此其为物也，极不易成，及其成，则亦不易灭。

梁启超在这里所强调的恰恰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最根本基础，乃在于中国以往作为“文明—国家”所形成的“国性”。这种主要体现为“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的所谓“国性”，并不是现代“新民”运动所能造成，而恰恰是现代“新民”运动的前提和依托所在。换言之，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长远之图，在梁启超等看来乃在于发扬宏大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特有的“国性”，否则中国就会像土耳其等国家一样，在现代转型中失去了自己的“国性”，从而实际不是文明的再生，而是文明的萎缩和死亡。在我看来，如果梁任公的“新民说”代表了 20 世纪中国的主流倾向的话，那么他在“大中华发刊词”等文章提出的“大中华文明—国家”思路，应该成为 21 世纪中国思想的出发点。

问：你在不久前发表的“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1]中曾特别推崇胡适九十年前写的“非留学篇”，现在又特别提及梁任公同样写于九十年前的“大中华发刊词”等，但这些毕竟都是九十年前的思想，在全球化的21世纪是否会显得太不“现代”了呢？

答：恰恰相反，正因为21世纪是加速全球化的时代，梁启超等当年坚持的“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在今天反而显示出了新的现实性甚至迫切性。不妨说，梁启超等这一“文明—国家”的视野，早已预示了冷战结束后西方学界亨廷顿等人提出的“多文明世界秩序”的问题。

亨廷顿认为，21世纪所有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这个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态”是否与其固有“文明母体”具有亲和性，是否能植根于其固有文明母体。亨廷顿认为如果一个现代“国家”不能植根于她原先固有的“文明母体”，而是千方百计与自己的文明母体断绝关系，力图想“换种”而进入一个本不属于她的“其他文明母体”，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Torn Country），其前途多半是令人沮丧的。他的这个看法其实正是梁启超当年提出所谓“国性”即“文明性”的着眼点。在梁启超看来，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他说的“国性”即深厚的文明底蕴，相反，有些国家“本无国性”，有些国家则是“国性未成熟者”，这些国家虽然也可以进入现代，但其进入现代乃是以其原有文明的死亡为代价的，亦即文明意义上的“亡国”；而正由于原有文明已死，这些国家往往面临“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问题，这也就是亨廷顿所谓“自我撕裂的国家”的意思。事实上，亨廷顿举出的最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国家”的例子，正就是梁启超当年一再要中国人引以为戒的“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土耳其。不同在于，梁启超当年是在土耳其道路尚未完全展开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土耳其“欲孵

[1] 此文刊于《读书》杂志2003年9月号，已收入本书。

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命运，而亨廷顿则是在 20 世纪末目睹土耳其已完全陷入“自我撕裂国家”的困境时来总结其失败的教训。我们确有必要来看一下土耳其道路，因为今天不少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往往是自觉不自觉地提倡中国走土耳其的道路。

土耳其本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图曼大帝国瓦解后的产物，属于地道的伊斯兰文明，但土耳其在现代转型中却以最大的决心彻底与伊斯兰文明断绝关系，力图成为所谓“西方文明”的一分子。从 1920 年代开始，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以政治强人的绝对权力加上其本人高超的政治手腕全力推动土耳其走向全盘西方化的道路，不但在政治法律等方面全盘引进西方制度，而且特别在宗教、思想、文化、教育，以及习俗等日常生活方面都彻底铲除伊斯兰传统对土耳其社会的任何影响，包括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帽（因其有伊斯兰教象征意义），反对女人戴伊斯兰头巾，等等。不过正如亨廷顿所指出，最重要的改革莫过于规定土耳其语的书写必须用拉丁字母，而不准用传统的阿拉伯字母书写，这一语言文字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导致日后受教育的土耳其新生代实际上不再能阅读传统的经典文献，具有从文化上彻底断根的效果。在外交上，土耳其全面追随西方，于 1952 年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反过来，在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上，土耳其则遭到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集体谴责，更被伊斯兰世界看成是渎神的国家。

初看起来，这一以“凯末尔主义”闻名的土耳其的改革似乎颇为成功，好像已经彻底脱胎换骨而融入了西方世界。但土耳其的悲剧恰恰在于，所有这些都只是土耳其人自己的幻想和一厢情愿罢了，因为不管土耳其如何自我阉割改种，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从来都没有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西方国家”，西方看重的仅仅是土耳其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要战略地位。这在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最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土耳其早在 1987 年就正式申请加入“欧盟”，但却被“欧盟”告知短期内其申请不会被考虑。但以后“欧

盟”很快批准了奥地利、芬兰、瑞典、挪威的申请，同时开始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波罗的海诸国等前苏东欧集团国家，偏偏迟迟不考虑土耳其要加入“欧盟”的强烈愿望。土耳其人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土耳其在西方眼里从来就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土耳其总统在 90 年代因此极端委屈地说：土耳其之所以无法成为“欧盟国家”，唯一的真正理由实际就是因为“我们”是穆斯林，而“他们”即欧洲人是基督徒，但欧盟偏偏又不肯明言此点，而总是找其他借口，例如土耳其的经济不行，土耳其的人权状况不好，等等。亨廷顿指出，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而又无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在文明上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极端沮丧感。

在申请加入欧盟不成的挫折下，土耳其在 90 年代初力图发展与苏联解体后的中亚新国家的关系，特别注重阿塞拜疆以及四个讲突厥语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实际上是颇为雄心勃勃地想充当突厥语族各国共同体的政治领袖。但这种欲当突厥语共同体领袖的梦想恰恰突出了土耳其的“突厥性”和“伊斯兰性”，恰恰更加突出了土耳其从来就不是一个西方国家，而是一个伊斯兰突厥语国家，这反过来就进一步促成土耳其国内本来就已相当强劲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如亨廷顿所指出，90 年代以来土耳其国内的主流舆论与生活方式都已越来越伊斯兰化：伊斯兰的清真寺、伊斯兰的学校、伊斯兰的报纸、电台、电视，以及伊斯兰的书刊、磁带、光盘都大规模增长，伊斯兰妇女更公然藐视土耳其世俗法令而戴着伊斯兰头巾上街游行和参加选举。而更重要的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从 90 年代开始已经成为主流大党，在 1996 年成为土耳其联合政府的执政党之一，而在 2003 年的议会大选中，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以大比数胜出，在国会五百五十席中拥有三百六十席以上的压倒多数，形成了伊斯兰主义政党已经足以一党单独执政的全新政治格局。虽然大选胜利后执政

党立即安慰西方说土耳其将继续成为“北约”成员，同时继续要求加入“欧盟”，但西方国家当然不会忘记，这个伊斯兰主义执政党的领袖 Erdogan 在 1994 年第一次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的市长后，就公开提出了“反对加入欧盟，支持退出北约”的政治口号，并且声称“世界 15 亿穆斯林正等待土耳其人民站起来，我们将站起来！”事实是，晚近十余年来伊斯兰的复兴以及伊斯兰主义政党的上台执政，已经强烈地挑战并削弱了土耳其从“凯末尔变法”以来形成的世俗政治体制。

但土耳其的尴尬在于，它既不可能融入西方，同时却也不可能真正立足自身。一方面，伊斯兰的复兴与伊斯兰政党的上台，只能使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更加疑虑更不信任更加视其为“非我族类”，而另一方面，伊斯兰主义政党虽然执政，却并不可能真正走自己的路，因为土耳其的真正政治权力乃在亲西方的军方手中，一旦伊斯兰政党走过头，土耳其军方必然会在西方支持下加以弹压，直接干政。由于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太过要紧，西方特别是美国绝不会允许土耳其真正脱离西方的控制。换言之，西方对土耳其的态度实际是既不能让它成为西方一部分，又不能让它脱离西方，而土耳其自己则处于无论如何西方化仍然不是西方，同时无论如何复兴伊斯兰仍得自我压抑的状态。可以预言，土耳其将会长期处于这种“自我撕裂”的状态中而难以自拔。

这里可以顺便提及友人陈方正教授对土耳其道路的研究，他对土耳其道路显然是比较同情的，我猜想他研究的最初出发点大概是认为土耳其道路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榜样，因为土耳其代表了最彻底抛弃传统、最彻底西方化的道路。但到最后，他也同样认识到，土耳其道路的结果是一个自我撕裂的社会，如他在其研究的结论中所指出：“由于社会中的伊斯兰传统与国家的世俗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近六十年来土耳其始终是一个神经紧张，甚至有点神经分裂的民族。换言之，凯末尔创造了一个能跻身于‘正常’现代国家之列的土耳其，但在灵魂深处她是抑郁，不欢畅的，在将来，也

看不出它恢复往日光辉的前景。”他因此也不禁问，凯末尔主义的道路就算成功，是“正确”的道路吗？这种现代化道路虽然“摆脱了历史、传统、宗教对土耳其的困扰，但同时似乎也窒息了土耳其人在文化与心灵上的生机”，这值得向往吗？

问：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但这种为了现代化反而导致“灵魂深处的抑郁而不欢畅”的不幸状况，到底应该如何解释？

答：我们不妨把土耳其道路称为“自宫式现代化道路”，就像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明教教主，为了练一门至高武功要首先把自己的生殖器割掉，称为“本门武功心法首在自宫”。其实很多现代化理论都是这种“自宫式现代化”理论，认为要练现代化这武功，就得先割掉自己文化传统的根，土耳其无非是在这方面走得最彻底而已。但一个人割掉了自己的生殖器，即使练了武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从前曾多次引用过伯林（Isaiah Berlin）强调个人自由与“族群归属”（belonging）同为最基本终极价值的看法，现在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不但没有给土耳其人带来欢乐，反而导致其“在灵魂深处是抑郁而不欢畅”的。这个原因就在于土耳其这种“自宫式现代化道路”不但没有满足土耳其人的“族群归属感”，反而割掉了这种归属，就像割掉了自己生命之源的生殖器，怎么可能快乐？让我再次引用伯林在其自传性的“我生活的三个组成部分”中表述的观点：

尽管我对个人自由的长期辩护，但我从来没有被诱惑到像有些人那样，以这种个人自由为名而否定自己从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语言……在我看来，这种对自然纽带的拒绝诚然崇高但却误入歧途。当人们抱怨孤独时，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因为被理解意味着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想法，以及亲密交流的可能，简言之，分享共同的

生活方式。这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否认这种需要乃是危险的谬误。

土耳其的改革是否促进了个人自由暂且不论，但土耳其现代领袖们要求土耳其人割掉自己的历史，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人和西方人，只能徒然造成土耳其人的内心困扰。因为土耳其人与欧洲人不可能“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想法”，从而也就不可能与欧洲人形成“亲密交流的可能”。恰恰相反，在欧洲人和西方人这个共同体中，土耳其人只能感受到“孤独”，只能感觉“没有人理解他们在说什么”。这种群体性的孤独感和不被人理解的极度沮丧感，自然只能导致土耳其人“在灵魂深处的抑郁而不欢畅”。说到底，欧洲和西方这个共同体并不是土耳其人的共同体，土耳其人那里不可能找到归属感。除非土耳其人成了欧洲和西方的领袖国家，所有欧洲人和西方人都说土耳其话甚至改信伊斯兰教，那样则土耳其人自然就会感到“灵魂深处极度欢畅”了，不过那样的话欧洲人西方人就会感到“在灵魂深处极度抑郁而不欢畅”了。

问：不过亨廷顿所说的这种“自我撕裂的国家”是不是非西方社会在现代化时比较普遍的问题？西方国家中是否不存在“自我撕裂”的问题？

答：那也未必。亨廷顿指出，澳大利亚就是西方国家想要加入亚洲文明的第一个例子。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在90年代初提倡澳大利亚应该“融入亚洲”而脱离英联邦，成为澳大利亚的最大争论问题。但亨廷顿认为基廷等人这种“脱欧入亚”的想法不免是为了急于挤进东亚经济繁荣圈而忽视了自己的文明归属。

在亨廷顿看来，无论是非西方国家想要“文明换种”挤进西方文明，还是西方国家想要“文明换种”挤进亚洲文明，虽然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实际上却是几乎不可能的，并非如西方学院派以为的只要“想象”一下就能出来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这种“文明换种”的可能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三个条

件中有一个不能满足，就会变成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这三个条件是：第一，本土精英阶层能形成高度共识愿意“文明换种”；第二，本土民众至少不反对“换种”；第三，接受一方文明共同体的认可接纳。以澳大利亚的“脱欧入亚”问题而言，上述三个条件一个都不满足。首先，澳大利亚精英阶层无法就此达成共识，而是恰恰为此分裂而争论不休；第二，澳大利亚民众也同样为此意见极端分裂；第三，亚洲各国普遍不承认澳大利亚是亚洲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方面说，澳大利亚能否融入亚洲社会首先取决于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对亚洲文化和社会有多大程度的了解；而马来西亚方面则直截了当地说，澳大利亚不是亚洲国家，而是欧洲国家，因此没有资格成为东亚经济论坛的成员国。亨廷顿因此说，澳大利亚实际只有两个选择，亦即要么放弃“脱欧入亚”的想法，回到自己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认同，要么澳大利亚就只能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

反过来，就非西方国家想要“文明换种”挤入西方文明的情况而言，亨廷顿认为土耳其曾一度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两个，亦即第一，土耳其精英阶层在凯末尔时代曾经达成“文明换种”的高度共识；第二，土耳其民众在相当时期至少没有特别强烈地反对；但问题是，土耳其无法具备第三个条件，这就是西方国家普遍不承认土耳其是一个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对土耳其的这种“文明上的拒绝”反过来必然极大地伤害土耳其精英和民众的自尊，从而必然逐渐瓦解土耳其曾经达成的精英共识和民众认可，导致土耳其成为一个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国家”。

非西方国家想“文明换种”挤入西方文明的另一个主要例子则自然是俄罗斯。俄罗斯与土耳其一样，从来不属于西方文明，而是属于拜占廷文明和东正教。但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俄罗斯就千方百计想成为欧洲文明一分子，而到苏联改革时代，戈尔巴乔夫更力图攀亲戚地说“我们是欧洲人，因为老俄国与欧洲同属于基督教”。

但在亨廷顿看来，这纯粹属于自作多情，结果只能是自讨没趣，徒然使俄罗斯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因为“欧洲”这个概念本身首先就是排除拜占廷的概念，而西方基督教本身首先就是排除东正教的概念。事实上俄罗斯想要挤进西方文明的困难性比土耳其还要大，因为上述“文明换种”的三个条件俄罗斯几乎每一个都不具备。首先，俄罗斯精英阶层中的“西化派”始终是少数，无法压倒精英阶层中的“斯拉夫派”，事实上俄罗斯作家在西方最有名的也恰恰主要是强烈主张斯拉夫主义的作家，例如从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现在的索尔仁尼琴；其次，俄罗斯民众即使向往西方，但历史形成的“大俄罗斯主义”自豪感使他们很难接受一切以西方为马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西方绝不会把俄国看成是西方的一部分，而总是看作西方的“他者”，因此不管“北约”如何东扩，不会扩大到把俄罗斯也包纳进来，否则“北约”就不知所谓了；而“欧盟”无论如何扩大也同样不会包括俄罗斯。总之，在西方看来，俄国永远是俄国，不是西方。而西方对俄罗斯这种“文明上的拒斥”自然极端刺激俄罗斯人走向“反西方”的心理。

问：你似乎一向对亨廷顿评价甚高，这与中国知识界强烈批判亨廷顿的主流倾向很不一致。现在你又以梁启超九十年前的“国性论”来印证亨廷顿的“文明论”，这不免让人有点惊讶。

答：我个人认为，冷战结束以后的西方思想界基本乏善可陈，大多都没有摆脱 20 世纪的旧思维。我们尤其可以注意一个悖论，即西方的自由派和左派一方面总是摆出一种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道德架式，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永远跳不出“西方中心论”，从罗尔斯的《万民法》，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到号称左派的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以及号称激进左派杰作的《帝国》等书，全都是最地道的西方中心论，他们的视野里实际从来没有非西方文明的问题。我很庆幸自己在芝加哥从学的师长大多是西方保守派思想家，这些西方